

# 东营村：走向现代化

——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变迁研究

徐经泽 李绍光 著



DONG YING CUN ZOU XIANG XIAN DAIHUA

**鲁新登字09号**

责任编辑：李传明

责任校对：黄金莲

**东营村：走向现代化  
——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变迁研究**

徐经泽 李绍光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东营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8.25印张 210千字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7-5607-1202-9/C·36**

---

定价：9.00元

**本书是山东省“七五”  
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 目 录

绪 言 ..... ( 1 )

## 社 区 经 济

第一章 农业——一个永恒的主题

- 一、农业基本情况 ..... ( 21 )
- 二、农业管理制度 ..... ( 25 )
- 三、农业发展水平 ..... ( 32 )

第二章 企业——社区工业化的发端

- 一、村建筑安装公司 ..... ( 40 )
- 二、村经济联合社 ..... ( 49 )
- 三、手工业 ..... ( 54 )
- 四、由市场之路走向工业化 ..... ( 55 )

第三章 市场化——走不尽的路

- 一、第三产业——东营的村内市场 ..... ( 61 )
- 二、探讨之一：  
    第一产业市场化——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 ..... ( 67 )
- 三、探讨之二：  
    第二产业市场化——乡镇企业如何成为市场主体 ..... ( 71 )

## 社 区 社 会

第四章 人 口

- 一、人口控制 ..... ( 79 )

二、人口的自然结构	( 83 )
三、人口素质	( 97 )
四、人口的社会流动	(100 )
第五章 家庭	
一、家庭的基础——婚姻	(105 )
二、家庭结构	(115 )
三、家庭功能	(124 )
第六章 家族	
一、“四大家族”	(137 )
二、家族文化的遗迹	(144 )
第七章 组织	
一、组织的类型	(151 )
二、组织的结构与运行	(157 )
三、组织与生活	(167 )
第八章 社区领导者	
一、社区领导集体	(173 )
二、社区领导者的产生	(176 )
三、社区领袖的作用	(184 )

## 社 区 文 化

第九章 生活方式和习俗	
一、日常生活方式	(194 )
二、岁时习俗	(199 )
三、礼仪习俗	(202 )
四、宗教	(210 )
第十章 教 育	
一、学校	(214 )
二、教师	(216 )

三、教育制度	( 221 )
四、幼儿园与学前教育	( 222 )
五、教育的效益与“瓶颈”	( 223 )
六、农村教育的自强之路	( 227 )
第十一章 走向现代文明	
一、医疗卫生	( 230 )
二、社会保障	( 232 )
三、村办企业职工保障	( 236 )
四、农村保险	( 237 )
五、社区发展规划	( 238 )
续篇：新的飞跃（1991—1992）	( 242 )
后记	( 251 )

## 绪 言

这是一部力求真实地记录当代中国的一个普通村庄所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并被作者希望成为今人与后人在研究中国农村现代化时所可以使用的一点素材的书。

我们不想采用惯常的著作模式，从绪言的第一页开始便对全书的标题做一番理论上的诠释。关于“现代化”一词究竟包括了什么样的内涵，读者和作者尽可以从林林总总的著作中去搜寻。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国农村在最近十几年间所发生的变化，居然可以把过去数千年间笼罩在她头上的东方农业文明光环映衬得黯然失色。这样说，并不是出于我们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偏爱，恰恰相反，此时此刻的我们，却常常看到和感到现实中充满了矛盾。我们强烈地认识到，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传统和现代的嬗变之中，从个人到国家，一切生活方式、道德标准、行为规范和价值体系正在剧烈的震撼中求得新生。这种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全面躁动给我们带来了数不清的抉择和机遇，我们坚信，只要国人抓住机遇，未来就会比现在千倍、万倍地美好。正因为如此，做为从事社会发展研究的学者，我们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自己的幸运，因为我们的的确确在感觉、参与、承受、观察和思考着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以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速度呈现出来的真正进步；往往是我们才把刚刚发生的变化汇聚到笔下，新的变化便又发生了。

然而，我们又总是怀着无法抹去的惋惜：在中国，这个变化来得似乎太迟了一点。

这个变化就是人们所讲的中国的现代化，她的全面展开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

——比中国共产党首次向全国和全世界正式宣告“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晚了6年；

——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晚了32年；

——比中国最后一次从外敌的铁蹄蹂躏之下站立起来晚了36年；

——比中国共产党诞生晚了60年；

——比中国推翻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并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晚了70年；

——比中国第一次被洋人的坚船利炮轰开沉重而腐朽的国门晚了140年；

我们炎黄子孙曾经为列祖列宗的四大发明极大地骄傲过和炫耀过，但最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祖宗的发明被外人拿去搞了一番改进之后，最终竟变成了他们有能耐掠夺我们这个民族的利器——那时怎么就没有什么专利权保护法？！仅仅在离鸦片战争不远的四百多年以前，我们的船队早已几度远涉重洋之后，他们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苦苦地彷徨和探索。那时候，我们的农民至少还可以非常现实地试图拥有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但他们的农民却只能在领主的庄园里过着多半是奴隶式的生活。

但是，历史永远也不会总是把辉煌赋予同一个人，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切断了欧洲通往东方的商道，欧洲人被迫从其他方向去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路。所以，在历史走进15世纪末的时候，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远航……一大批先驱者走向了世界。而在14世纪就已经在欧洲出现的枪炮也导致了军事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使得骑

士阶层的军事作用几乎丧失殆尽。自然，过去那种以骑士和城堡为基础的领地分封时代便永远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强大的王朝。同样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伟大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彻底动摇和结束那个漫长的奥古斯丁时代，神学污垢埋没之下的古代文化重放异彩。以彼特拉克、薄伽丘、乔叟、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先驱所宣导的人文主义思想终于引发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和文化启蒙运动，其结果是把人从神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新思想得以迅速传播。这一切都昭示着，一场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伟大变革就要在欧洲大地上爆发了。

这场变革终于在18世纪中叶爆发，她的标志便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她把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经历的最漫长的农业社会迅速带入了工业社会。现代化，也就从此开始了。

工业革命首先从与农业关系最密切的行业开始。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使世界市场迅速扩大。世界市场的扩大，迅速改变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先前的关系。本来，首先完成这些发现和开通新航路的先驱者是西班牙人，但由于这时英国已经利用它先进的炮舰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海上霸权，所以，世界市场的扩张首先引起了英国毛纺织业的迅猛发展。由于毛纺织业对羊毛的需求增长，一些领主为发展养羊业而圈占农民的公有土地，于是，英国历史上有名的“羊吃人”惨剧——圈地运动——便大规模地爆发了。为了养羊，新贵族使用暴力手段剥夺农民的土地，他们残暴地拆除农民的房屋，毁坏村庄，把农民赶走，用栅栏和篱笆把土地圈围起来，或者自己经营牧场，或者出租给农业资本家；自耕农彻底消失，公有地不复存在，早在14世纪农奴制解体以后形成的小农经济经过300余年的圈地运动便土崩瓦解了。失掉土地的农民则大批地沦为

乞丐、盗贼和流浪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同时，新兴资产阶级在一批贵族中的同情者——辉格党集团——的帮助下，以工业资产阶级为中坚，经过几十年的斗争，动员了全体人民，彻底孤立了反对改革的托利党贵族，终于在1832年取得了第一次议会改革的胜利。这次胜利瓦解了旧贵族操纵议会的政治基础——56个袖珍选区丧失了议席，30个衰败选邑只可获得一个议席——第一次把新兴资产阶级全面推上政治舞台。这次议会改革，为拥有十镑财产资格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村富裕农民争取到了选举权，但这仅占当时英国总人口的3.3%。在农村，随着衰败选邑政治作用的削弱，在圈地运动中被迫付出极大代价的破产农民的悲惨遭遇并没有任何改善，他们也没有争回自己失掉的利益的权利，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斗争还不会停止（直到1884～1885年的第三次议会改革，农村才获得了和城市一样的选举权，也就是说，英国工业革命最先触及了农业，而农民和农业工人却是最后一个获得基本政治权利的阶层）。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和满足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新兴资产阶级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惩治浪人的法律，强迫他们走进工场主的作坊做工，于是便造就了庞大的工人阶级，而资本主义在农村也取得了完全胜利，土地大量地集中到农场主的手中，使自营农场所成为英国当代最普遍的农业经营形式。

在欧洲现代化的另一个发源地——法国，现代化经历的却是另外一种历程。法国的中世纪，是一个国家支离破碎的时代，由于诸侯割据，国家分裂，国土常遭外人侵袭，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337～1453年的英法百年战争，战争的最终结果是法国人驱走外侮，那么，剩下的问题便是如何统一法国了。在百年战争中，法国贵族立下了卓著功勋，但同时国王也得到了全国的支持，所以，除了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国王来控制那些强大的贵族之外，法国的统一已经别无选择。从亨利四世开始，历

代国王都采取恩威并施的办法来对付贵族，以至于到路易十四时，贵族集团为了荣华富贵完全交出了权力，变成国王的廷臣，而实权则旁落于出身于殷实的中等人家而买官从政的官吏手中。根据当时法国的法律，中等人家一旦买了官，便会晋爵，而一旦晋爵，便不能再从事经济活动；贵族则更不能从事工商业或公益性行业，否则便会失去既有的一切特权。这样，法国的官吏与贵族既然不能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获得利益，他们也就完全丧失了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机，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唯一选择就是守旧；官吏在专制体制下迅速腐败，贵族则在他们传统的大本营——农村——横征暴敛。他们始终不肯做出半点让步，让人民获得一点喘息的机会，反而变本加厉，导致民怨沸腾。终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革命来临了。而且，在革命还未开始时，贵族们就牢牢地把自己置于了革命的对立面。1789年，“第三等级”领导的革命暴风骤雨般爆发，平民百姓也迅速加入了武装革命的行列，巴士底狱在一天之间便被攻克。然而，反动势力是如此顽固和强大，以至于从三色旗第一次飘扬在巴黎上空后的近百年里，反动势力与革命势力又经过了无数次铁与血的较量，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法国才真正摆脱了君主制的阴霾，彻底巩固了共和国。就工业化进程而言，在这动荡不安的一百多年间，则是在拿破仑三世掌权的20年间，才运用他保守专制的力量铺架铁路、改造巴黎、承建苏伊士运河、发展国内工商业，从而使法国走完了工业革命的大部分路程，成为欧洲的工业大国。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终于使新兴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消灭了君主专制，剥夺了贵族特权。贵族对农村的控制不复存在了，然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庞大的小农阶级。农民在大革命后得到了土地，成为小私有者，从此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政府的干预下，法国的土地才开始集中，大农场和大合作社

逐步取代了小农经济，成为法国农村经济的支柱，大大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

从英、法这两个现代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所走过的历程可以发现，工业革命的主导力量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他们的对立面是封建王朝统治下的整个农业社会。只因为他们在面对王权与贵族的统治时和农民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这才在革命中采取了不约而同的行动，但是，工业革命的领导力量却从来没有主动寻求过农民的合作，因为土地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而农民之所以能够摆脱王权与贵族的统治，不过是工业革命的副产品而已，否则，为什么在此之前发生的那么多次甚至是惊天动地的农民起义，最终都没能改变过整个阶级的命运？英国道路与法国道路之不同在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是由一部分新贵族参加并发挥过领导作用的革命，他们在革命胜利后自然要分享一部分果实，这在他们的根据地——农村——的表现就是集敛了大量的土地，但他们又不能象过去的旧贵族那样占有农奴，因而也就把农民推上了工业化之路。但是在法国，贵族始终是革命的对立面，当革命把他们彻底摧垮以后，他们丧失了一切权力，也丧失了在农村的根基。这样，革命初成之后，农村就只保留下一个阶级——农奴，解放了的农奴终于可以大胆地分割那些已经没有了主人的土地，变成了小农。当时的法国农民也许绝对会觉得他们比英国的农民幸运得多，因为革命使他们在自己的家门前便获得了新生，而英国的农民在革命后却要背井离乡去异地谋生。但后来的历史却把不幸加在了法国人的头上——正是因为他们的工业革命造就了那一百多年的小农经济，现代化才比英国落后了许多。

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我们，在奴隶制时代结束以后，小农经济是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障碍。

而中国，竟然经历了2000多年的小农经济。

我国早于欧洲1000多年进入封建社会，在此后的许多年里，华夏大地烽烟四起，诸侯割据，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农民开始得到了自己的土地，秦国的部分农民终于变成了小私有者。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我国才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而我国从奴隶制下脱胎而来的小农经济，在此前后也大致定型。此后2000多年间，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经济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达官贵族、缙绅豪富无不不择手段地集敛土地，广大农民则失去土地，变为佃户或流民。于是，2000多年间，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围绕着争取土地所有权进行了无数次交锋，但是，广大农村以租佃制和少量自耕农为主体的生产关系却始终没有变化。这期间，农业随着朝代的更迭而兴衰，而手工业和商业则自始至终依附在强大的小农经济之上。

明朝中期，我国的江宁、苏州等地的丝织业首先形成了较大的手工业作坊和工场，出现了大包买商，这表明，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出现。尽管它还非常脆弱，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严重束缚，但它确实在缓慢地发育着。然而，这时北方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民族——女真族——强大了起来，他们乘中原大地战火纷飞。朝廷自顾不暇之际踏入中原，最终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满清王朝，而这时，欧洲大陆的工业革命正在风起云涌地展开。清王朝虽然终于统治了整个中国达267年之久，并在初期发展了生产，增强了国力，但它命中注定不能挽救封建社会行将就木的命运，等到道光皇帝登基时，清王朝已是四面楚歌了。这时，欧洲的工业革命已经大功告成，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用他们踌躇满志的强盗贪婪的目光傲视全球，当然也不会放过东方帝国这块令他们垂涎已久的硕大肥肉，任人宰割的命运就这样降临到中国人头上。19世纪30年代末期，一直处心积虑要打开清政府闭关自守大门的英国资产

阶级，以虎门销烟为借口，乘机发动了侵华战争。腐朽的满清政府在外敌面前卑躬屈膝，古老的东方农业大国在如日中升的工业社会面前同样也束手无策，于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首先带给中华民族的却是无比的耻辱。现代化，被洋人的枪弹裹挟着强加在了中国人的头上。这与其说是国弱民贫的悲剧，还不如说是在历史进步面前冥顽不化的哀歌。

鸦片战争以后，尽管有爱国将士可歌可泣的奋勇牺牲，尽管有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顽强抵抗，但落后的生产力终究不可能战胜先进的生产力，中国迅速地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样，即使在当时腐朽的满清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部分人深深感受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切肤之痛，力主“自强新政”，他们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求强”的军事工业，创立“求富”的民用工业，办起新学堂，派遣留学生，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这就是著名的洋务运动。

但洋务运动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根本就不是一场社会发展意义上的革命，与西方工业革命对人类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更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所以它根本不可能改变广大人民的凄惨命运，从而也不可能改变农村社会的小农经济。但是，它却不自觉地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扩大和加深了中国人对外国的了解，壮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壮大起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封建双重要求的推动下，终于在本世纪初期彻底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他们的力量与强大的外敌相比又是如此之小，以至于根本无法充当反帝反封建的坚定领袖，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军阀混战所吞没，而封建残余势力则盘踞到广大农村，这就把中国农村与现代化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远了。因此，即便是刚刚接受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他们要推翻的本来是资产阶级，但当时的中国却既有比民族资产阶级更强大更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又有以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为强大后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能不把反帝反封建做为当时的主要目标。而那时，西方工业强国的国内经济危机已经爆发，德国在君主制与共和制的激烈拉锯战中轻而易举被交付给了纳粹魔鬼；在东方，明治维新成功后的日本也急于赶上西方列强的步伐而迅速滑向军国主义。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大半个世界在法西斯的铁蹄践踏下痛苦地呻吟，大半个中国也被日本军国主义所鲸吞。中国的阶级矛盾暂时缓和下来，全民族充分动员起来投入抗日战争。抗战期间，由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农村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得以缓和。如果是在和平时期，这也许是以较小的代价把农村推向现代化的绝好契机，但民族战争不可能给文明的发展带来积极作用。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而导致的阶级矛盾的缓和注定是短命的。抗战胜利以后，阶级矛盾在民族矛盾的消失下重趋激烈，早已被中国共产党发动起来的农民已经不再满足于减租减息，而是坚定不移地要得到自己的土地。在解放区，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运动——确切地讲，应该叫做土地革命——彻底剥夺了地主。中国共产党人借助于农民的力量，组成了紧密的工农联盟，最终在全国夺取了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但城市中本来就很弱小的工业却被长期的战争蹂躏得满目疮痍，而且在国际社会上，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峙日趋分明，新中国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的封锁中只能求助于苏联的帮助而恢复经济。人民对当家做主的亲身感受激发了高昂的劳动热情，国民经济在军事化手段的组织下得到很大的恢复。但是，也许是由于我们对贫穷落后的切肤之痛体验得太深太久，也许

是由于我们急于增强国家实力以抗衡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和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也许是由于我们盲目而又执着地相信了利用军事化手段组织经济生活的作用，随着“三面红旗”的擎起，一切生产资料乃至主要生活资料都被收归国有；在农村，延续了2000多年的小农经济终于被划上了一个断然的句号。

但是，揠苗助长的结果只能是幼苗枯萎，三年自然灾害更给我们稍有起色便又开始步入歧途的经济雪上加霜。在这双重的打击下，我们的经济几乎就要窒息了。怎么办，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被制造了出来，横空出世的阶级矛盾掩盖了经济上的困境，登峰造极的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一搞就是10年。而事实上，这10年，恰恰就是建国以来经济上最为困难的10年，现代化的进程被迫中断了。同样是在这10年，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借助于国际分工的转移和国际贸易的增长，韩国和台湾地区在其农村实行土地改革（而不是革命）的基础上，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日本则崛起为东亚地区的一颗光彩夺目的现代化新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步入了世界第十一经济强国的行列。

事实已昭然若揭：再不发展经济，国家将更加落后，我们面临的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成为我们绝路逢生的唯一途径。本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彻底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

以工业化为先导的现代化首先要摆脱传统农业社会的束缚，所以，现代化要从农村开始。现代化要把大批交出土地的农民改变成工人，而且，还要是谁取走了农民手中的土地，就要由谁把他们变成工人。在70年代末期的中国，国家控制着全部土地，但却无法把所有的农民都变成工人，所以，这项历史使命只能由农民自己来完成，而这就需要首先把土地交给农民，

把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的体制引入农业。于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了，继而一批批农民变成了乡镇企业的工人。随着这个过程的演进，国家控制土地的手段和以产品生产，计划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人民公社也随之瓦解了。然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在那个中断经济发展的扭曲时代结束之初对千百年来延续不断的小农经济的续尾和农业现代化的序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育和完善过程中，它必然要遵循农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即土地经营由分散趋于集中，我们不难预测土地集中经营成型之日便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消亡之时，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有所不同的是：土地集中的主流方向将不是趋于个人，而是趋于农村社区，因为中国几十年来的计划经济也为农村留下了两件宝贵的遗产，即农村社区组织的有力量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集体化。

现在，这个过程已经开始。

农村现代化一直是我们——作者——所倾心的课题。本书作者之一——徐经泽教授——在他亲手创建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之前便致力于这项课题的研究，而这个时间恰好与农村现代化的启动时间同步。山大社会学系成立以后，先后又有多位中青年学者参与了这一课题。1985年，在山东省桓台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社会学系在该县设立了第一个研究基地。

桓台地处山东中部丘陵与鲁北平原的接壤地带，有500多平方公里的沃野良田。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这里就已有先民居住，属龙山文化的一部分；从1228年首次置县迄今也有760多年的历史。我们的研究基地建立时，桓台已是我国的商品粮基地县。

在建立起基地之后，山大社会学系的师生多次到该县的索镇（县城驻地）、起风、耿桥、荆家、马桥等乡镇进行各项专